Vol. 35, No. 6 Nov. 2005

主题研究:区域经济与制度研究

# " 浙江现象 '解读

# 原华荣

(浙江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浙江现象"是由发展绩效、发展特征、发展条件、制度创新、"浙江精神"所共同展现的一幅全方位图景"浙江现象"的生成,赖于区位、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初始资本的累积优势,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和"浙江精神"的交互作用。内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展现和生成的各个方面 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浙江现象"并非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不对应形成的"错位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区位"为共有解的"区位现象"。浙江的特殊性在于其独有的展现和成因发展条件在新形势下的转变可能会影响"浙江现象"的持续辉煌而须亟谋良策。

[关键词]"浙江精神";"浙江现象";解读;"区位图景"

[中图分类号]F4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6-0052-10

# 一、" 浙江现象 "

对"浙江现象",可从发展效绩、发展特征、发展条件、体制创新(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及"浙江精神"(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等五个方面来展现和把握。

#### (一)发展效绩

浙江省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效绩是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2003 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 9395.00×10<sup>8</sup> 元 居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列各省、区、市第 4 位,与 1978 年的 123.78×10<sup>8</sup> 元相比增加了 75 倍(指现价 若按可比价为 21 倍,下文括号中所列均为可比价),年递增率高达18.91%(13.09%),显著高于全国同期平均的 31.4 倍(8.4 倍)和 14.92%(9.38%);人均 GDP 20 147 元,居上海、北京、天津之后列第 4 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 13 180 元和5 413元,低于上海、北京均列各地区第 3 位。居民消费水平 6 451 元,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居第 4 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21.6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50.73 平方米,居上海之后列第 2位<sup>①</sup>。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有产业结构良性调整,财政收入的急剧增长和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

<sup>[</sup> 收稿日期 ] 2005 - 06 - 10

<sup>[</sup>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sup>[</sup>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1JAZJD840005)

<sup>[</sup>作者简介]原华荣 (1944-) 男 陕西蒲城人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人口、资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参阅《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

# (二)发展特征

浙江发展过程的突出特征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私经济和专业市场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0 年以来更是迅猛异常:工业产值占全省的比重,在 1993 年占" 半壁江山",1995、1996、1997 年相继达到" 三分天下有其二 "、" 四分天下有其三 "和" 五分天下有其四 "。 1998 年 浙江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  $168.42\times10^4$  户 从业人员  $420.7\times10^4$  人,注册资金  $813.7\times10^8$  元,实现工业总产值  $4800\times10^8$  元 国内生产总值  $1390\times10^8$  元,占到全省的 28% 和 50%,作为" 市场大省"的浙江,1998 年有各类商品市场 4619 个 成交额  $3209\times10^8$  元,分别比 1978 年增 3.4 倍和 372 倍。 其中 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 373 个,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当年成交额高达  $196.8\times10^8$  元和  $180.2\times10^8$  元 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商品市场成交总额、超亿元市场数和单个市场年成交额三项指标,多年来保持全国第一、第二位,商品市场成交总额、超亿元市场数和单个市场年成交额三项指标,多年来保持全国第一、1190.51-54.200-203.226-228121.9.5.69.75 110.500-83.500-91.131.100.86-87)。

W.T. MATCHEN, C. M.								
项目	地区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福建	山西	陕西
人口	104 人	7 954	7 406	9 125	4 680	3 488	3 314	3 690
	人 $/\mathrm{km}^2$	442[ 10 ]	694[4]	581[6]	444[9]	281[ 16 ]	211[ 19 ]	179[ 22 ]
外资利用		133 400 1 1					21 164[ 22 ] :	36 00 <b>5</b> [ 19 ]
水资源	$10^4 \text{m}^3 / \text{km}^2$				85.63[6]		6.82[26]	
森林覆盖率	%		4.51[26]		50.830		11.72[23]	
环境支持系统	指数		44.84[13]				29.30[31]	
生存资源禀赋	指数				53.94[10]		39.82[26]	
区域生态水平	指数	72.14[5]		59.78[16]				46.46[25]
	108 元	13625.87	12460.83	12435.93	9395.00	5232.17	2456.59	2398.58
国内生	%	11.62[1]	10.63[2]	10.61[3]	8.01[4]	4.46[11]	2.10[20]	2.05[22]
产总值	10 <sup>4</sup> 元/km <sup>2</sup>	758[7]	1167[4]	792[6]		422[9]	157[ 18 ]	117[21]
	元/人				20 147[4]	14 979[7]	7 435[ 19 ]	
文 盲 率	%	5.17[2]			8.55[15]		5.68[4]	9.82[21]
人		33 117[ 19 ]	32 882[ 20 ]	32 755[ 21 ]	36 650[ 12 ]	37 760[ 10 ]	31 779[ 23 ] :	34 438[ 14 ]
口初中		36 681[7]	36 365[9]	36 649[8]	33 353[ 17 ]	33 544[ 16 ]	38 921[5]	33 10 <b>5</b> [ 19 ]
受 高中		9 600[8]	10 176[6]	7 503[ 19 ]	8 379[ 13 ]	7 262[ 23 ]	8 191[ 14 ]	9 353[ 11 ]
教 中专	人/106人	3 328[ 12 ]	2 903[ 20 ]	3 552[9]	2 406[ 29 ]	3 480[ 10 ]	3 398[ 10 ]	3 002[ 19 ]
育 大专		2 401[ 14 ]	2 543[ 11 ]	2 270[ 15 ]	2 081[ 18 ]	1 948[ 21 ]	2 415[ 13 ]	2 585[9]
程 大学		1 065[ 12 ]	1 296[8]	1 024[ 14 ]	1 049[ 13 ]	9 <b>73[</b> 16 ]	96¶ 16]	1 525[6]
度 研究生	<u>:</u>	91[6]	80[9]	43[16]	<b>66</b> [ 10 ]	47[13]	38[ 18 ]	92[5]
教育程度	年	8.07[7]	7.76[11]	7.58[17]	7.51[20]	7.50[21]		7.71[15]
综合水平	分	11.61[10]		10.66[14]	10.40[17]	10.27[21]	11.68[7]	11.41[11]
技术人员	人/104人	251[ 14 ]	223[ 18 ]	257[ 13 ]		246[ 15 ]	277[9]	271[9]
人力资源能力		11.15[4]	10.87[5]	6.99[10]			6.22[13]	4.94[20]
。次料束道,《中国 2000 年上日華本次料,上皿》中国统计中版社 2000 年版《中国统计年版》中国统计中版社 2002								

表 1 浙江等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科技和教育水平

\* 资料来源:《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内数字为在全国的位次。

# (三)发展条件

从限制性条件看,浙江发展的背景为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口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相对薄

弱、偏低。浙江为中国人口稠密、资源匮乏"资源瓶颈"强烈的省区之一,人口密度 444 人/km²,列各地区第 9 位;人均耕地 0.045hm²(为 1996 年土地详查数 2003 年统计数为 0.034 hm² 列各地区第 27 位)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 95%,工业发展所需主要矿产省内几无。浙江人口所受教育程度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人口文盲率 8.55%,平均受教育年限 7.51 年,教育水平综合均值 10.40 分,分别居各地区第 15 位、20 位和 17 位,每万人中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41 人(2002)居第 16 位(见表 1)。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东西关系、台海形势和"三线转移")浙江处于不大受关注的战略地位和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1952—1978 年,国家对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累积仅 411 元 1 [p.31、36 [2 [p.32、46]],由此造成经济特别是工业基础的相对薄弱。

# 二、"浙江精神"

# (一)浙江精神"

- 1"浙江精神"。"浙江精神"指孕育于传统文化、经自然、社会环境历练代代相承、并在改革开 放以来通过制度创新、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强化和提升的一种属于浙江民众的精神。这一精神或被 看作"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究实效",或被视为"自主敢为,务实拼搏",或被概括为"自 主、拼搏、务实、变通 [2] pp. 212 - 215 , 241 - 243 [3] pp. 4 - 6 [7] (pp. 153 - 159)。 本文将之归结于"自主""求利"、 "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和"务实变通"五个方面。"自主"指自己做主决定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自主 "意味着对依赖思想、" 宿命论 "的摆脱和' 个体自觉 "——" 自强自主、 自立自决 '的实现。" 求利 '指牟利赚钱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包括求利的目的性、求利的正当性即 合道德性 体现着自然人性的回归和经济理性。这一理念的张扬 意味着对"耻于言利 羞于经商" 传统观念的扬弃。"开拓创新"指敢想敢干、敢闯敢冒、敢向权威挑战、敢于冲破旧体制、敢为天下先 的大无畏气概: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的开拓 创新精神——是对保守封闭、瞻前顾后、畏头畏尾、犹豫不决的摈弃。 " 拼搏进取 "是一种吃苦耐劳、 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种精神 如同'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般顽强的野草 ,而'走遍千 山万水 想尽千方百计 说尽千言万语 历经千难万险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则是其真实写照。"务实 变通""务实"指不盲从、不张扬、不图虚名、不赶时髦,不尚空谈、不坐而论道、轻形式重内容、注重 实干,以实干求实效,以实效作选择(评价尺度),"变通"精神指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观念灵活、善于 变通、不拘形式,体现了对条条框框、思维定势的抛弃。
- 2.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人口素质指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精神素质、劳动质量、生存水平(生活质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sup>8 I pp. 19-22)</sup>;人力资源指作为资财之源的人力(人的能力)与自然资源概念对应,包括人口素质除生存水平之外的其他要素;人力资本指作为资本的人力,即具增殖能力的人力,与物质资本的概念对应,其要素与人力资源同。人口素质、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有三点。其一,人口素质是从内在价值出发对人口质的界定,只有质的规定而无量的要求;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从外在(工具)价值对人的能力的界定,既有质的规定又有量的要求。其二,元(要素)同义不同。元同,既表现在各要素内在所指在各种规定下的不变,又指各种规定在要素层面不同程度的重叠;而同一要素,在不同规定下所体现的含义则不相同——高科学文化素质所展现的,从人口素质角度来看是某一人在能力展现方面的高质量,或人全面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而对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来说,则分别意味着该人在其展现方面获取资财、配置资源、增殖资本的高能力。其三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体现。以上分析表明,

在要素之间,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体现;在系统之间,同一要素又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进而呈现多重性:某一要素在展现自身的同时,又展现着系统其他要素和所在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或是该要素处于某一系统的同时又属于其他系统。由是"浙江精神"所展现的便不只是民众的精神状态,而且还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质量,进一步而言,还代表着浙江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状况。

### (二) 浙江精神 "的文化传承"浙江精神"的孕育和历练

"浙江精神"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并历经磨炼。"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数,厚于滋味。善进取 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是对浙江传统文化最本质的概括。其一是经世致用、崇尚事功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善进取 急图利"、勤劳务实的功利主义,既与经济的繁荣相辉映,形成南宋以来"江浙人文渊薮时代",又始终贯穿于浙江的思想学术之中,并被上升到哲学高度,其结果是功利主义和'工商皆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广泛认同。其二是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自然人性论和主体性精神。"好淫乐"、"厚滋味"所带来的,是对工艺美术发达的刺激、"奇技之巧出焉"和一代又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能工巧匠的产生。其三是重商传统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其四是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在遭遇西方文化挑战和回应正统文化、中原文化和1950年以来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显文化"的过程中,浙江传统文化显示并历练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使'人性柔慧"不断强化、重商传统、功利主义、自然人性论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形成文化的开放性和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其五是大众性。这是浙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经久不衰、影响力巨大的根本性因素[2][pp.207-208 211-218 241-246 [3][pp. 41-57 64-75 103-107)[7][pp.165-175]。

江南早期工业化是'浙江精神'和浙江人力资源蕴孕和历练的一个重要时期。据李伯重的研究 江南 江浙一带 尸期 晚清 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工业化 手工业 )有五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农村'过度工业化'和大量劳动力参与。农村工业化、商业化的发展 使工业的发展与农业不相上下乃至超过农业 政'农人纺经十之六 遂使家家置纺车 无复有心种菽粟 (湖州南浔镇)。其二是行业十分广泛。江南的早期工业 以纺织 棉、丝 和食品(食物加工、酿酒、制茶、食物再加工、制盐、榨油等)为主 此外有成衣、日用百货、烟草加工、造纸、印刷、工具制造、建筑业和奢侈品等。其三是外向型。原料、材料、燃料)多采自江南以外 产品销往国内和国外。其四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组织化(账房制度)和竞争的发展。其五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男子多工艺事 各有专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 织维刺绣 工巧百出 他处效之者莫能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既在于脱盲和'读、写、算'能力培养的'大众教育'的开展 又在于分工和长期专业化训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 十二三岁即能织布"农妇每年纺织长达二百多天 更在于竞争的推动和市场化、组织化对劳动者独立经营能力、组织能力、市场意识的培养5 【pp. 18-29 40-45 49 78-97 101-126 142 189-192 203-206 211-216 427-429 437-439 443 450-453 500-514)。

### (三)浙江精神"与"浙江现象""浙江精神"的强化

"浙江现象"是"浙江精神"的载体。"精神"是通过"现象"体现的 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没有"浙江现象"便无所谓"浙江精神"。而"浙江精神"是由浙江传统文化孕育,在改革开放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浙江现象"为参照,并在"浙江现象"形成过程中得以强化的一种"精神"。"浙江精神"既体现于"浙江现象"之中,又是"浙江现象"的重要展现,既是"浙江现象"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又在"浙江现象"的形成、两者的正反馈循环中得到强化和提升。"自主"、"求利"、"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务实变通"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成因的各个方面,故同样可以说,没有"浙江精神"也不会有"浙江现象"——没有"浙江精神",便难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较全面的人力资源优势,浙江人民便不会有强烈的创业冲动进而形成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和不断的制度创新,便不能有效抓住计

划经济失误带来巨大市场空间的机遇并形成资本初始积累的优势,便不会有民营资本的壮大、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个私经济的蓬勃发展,便不会有'市场大省'的形成和'轻型'经济结构、"两头'在外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样,也不会有政府的'无为而治"……

# 三、" 浙江现象 "解读

"浙江现象"之主要成因,可归纳为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制度创新优势、初始资本累积优势、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和"浙江精神"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等六个方面。

### (一)区位优势

- 1. 区位优势。东西关系、台海形势的缓和扭转了浙江的战略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则使其之区位优势得以显现和充分发挥。凭借地处沿海、交通方便、信息通畅、邻近上海,有利于吸引中外资金、技术、人力的优势,浙江在改革开放以后便很快成为中国沿海经济增长极(地带)的发展中心之一。1980 年以来,东、中、西发展阶梯式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中国经济密度(104元/平方千米,2003)位列前 10 位省、市基本分布在东部和沿海,即是优势区位对发展根本性的有力证明:上海(7587×10 $^4$ 元)、北京(2232×10 $^4$ 元)、天津(2054×10 $^4$ 元)、江苏(1170×10 $^4$ 元)、浙江(891×10 $^4$ 元)、山东(792×10 $^4$ 元)、广东(758×10 $^4$ 元)、河南(426×10 $^4$ 元)、福建(422×10 $^4$ 元)和辽宁(405×10 $^4$ 元)(见表 1)。
- 2. 生态(环境优势)。浙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生长季节长、植被覆盖度高、物种多样性丰富、地势起伏较小,是中国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之一。森林覆盖率 50.8% 居各地区第 3 位;多年平均降水量 1604 毫米,水资源总量 955.41×10<sup>8</sup> 立方米,每平方公里85.63×10<sup>4</sup>立方米(2002、2003年平均),排各地区第 6 位,为全国平均(28.7×10<sup>4</sup>立方米)的 3.21 倍。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4年),2001年浙江环境支持系统指数52.43,排在西藏、海南之后居全国第 3 位,区域生态水平指数 80.98,仅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生存资源禀赋指数 53.94,列全国第 10 位 见表 1 )。

#### (二)人力资源优势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初步工业化阶段和进一步工业化阶段初期,浙江人力资源满足了生产对劳动力质和量的需求,并具较为明显的优势。

- 1.人口受教育程度满足了生产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明显的阶段性。据马淑鸾等(1992)对中国人口素质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初步工业化阶段,衡量劳动力质量是否适应生产发展的主要指标是小学普及率,转入进一步工业化阶段是中学普及率,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则来自高等教育及人才的引进 4 I pp. 40 47、338 350 )。对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多数地区来说,人口受教育程度并未构成对发展的制约。而到近期,浙江人力资源又有显著提高——2000年每 10万人口中的大学生、研究生数排全国第 13 位和第 10 位,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4),1999年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 10.33,居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之后列全国第 6 位 见表 1 )。
- 2. 具经商传统,市场意识强,有大量求利、外向型的劳动者及一大批独立经营者和能工巧匠。在传统重商文化长期熏陶下,早期工业化形成的观念、习俗、技能代代相承,为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大批具独立经营能力的小企业家、大量的能工巧匠和具经商传统、市场意识强、求利、外向型的劳动者(参见本文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工业化的实践,则使其资源配置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而这又恰好满足了"新增长理论"关于收益递增的"外在效应"模

型的主要条件——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产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6] pp. 304 - 305 )。

3. 有着更能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劳动者。人多地少和计划经济"边缘群体"有限制而少保护的"体制外群体")地位形成的甚于其他地区的生存压力、体制压力,为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准备了大量比其他地区更能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劳动者。

## (三)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优势

- 1.广大群众强烈而持续的创业冲动。浙江广大群众强烈而持续的创业冲动,首先来自巨大的生存压力。其一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形成的人口和资源压力,其二是计划经济束缚,尤其是处于计划经济'边缘地带'之"边缘群体'地位所面临的'体制压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晚清以来作为江南富庶之地所形成的美屋华服、"厚滋味"传统文化习俗的向往。而当强烈的创业冲动变为美好的现实时,又进一步被强化并持续下来。
- 2. 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和不断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降低单位交易费用、激励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调整收入分配等使主体获得最大潜在利益的活动,过程是"制度创新—制度均衡—制度再创新 f2 Ip.61 I3 Ipp.77-78)。"浙江现象"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可归于其体制改革的先发和不断的制度创新。而浙江成为富于创新、创新多发和不断创新地区的原因,一是作为"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有约束而少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给这一地区带来更大的"体制真空"。这同时也因为"创新空间"以及旧体制对人们观念创新的阻力较小;二是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制度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为制度创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和支持;其三是广大群众强烈而持续创业冲动所形成的经久不衰的制度创新动力 I I pp.113-118 I 31-133 I 2 I pp.23-31 61-65 I 3 I pp.77-79)。
- 3. 宽松的改革和创新环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支持和引导改革的政府'无作为'政策 给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宽松环境,是体制改革成功和制度不断创新的关键。其之要义,一是需求诱导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结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专业市场的自主发生和政府推动 ;二是避免旧体制阻力,使制度变迁代价最小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 [1] [pp. 131-133] [2] [pp. 62-67, 159-168]。

#### (四)初始资本累积优势

- 1. 计划经济失误带来的机遇——巨大市场空间。20 世纪80 年代以前,中国在长达30 年的时间里实施了一条重城,市,轻乡(村),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农村的凋敝、国民的贫困和生活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计划经济的失误,使改革开放后国民对物美价廉生活日用轻工产品的有效需求十分强烈,进而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一机遇的存在,使浙江有可能率先掘到"第一桶金",形成资本初始累积的优势和民营企业的强大、民营资本的雄厚,在作为对政府、外资推动替代的同时,又以其强烈的市场取向有力地支持、推动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 2. "轻、小、加'的工业优势、商业优势与巨大市场的占领。浙江' 轻、小、加'的工业优势和商业优势,既承之于江南早期工业化以来的传统,又发扬于改革开放前后的当代。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浙江才能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轻工日用品并迅即占领全国各地市场 率先掘到' 第一桶金 ":1992年,全省轻工业产值达到  $1586.3 \times 108$  元,人均 3735 元( 全国 1493 元),分别排江苏、广东、山东和上海、天津、北京之后居全国第 4 位;工业产值的比重升至 63.5%( 全国 47.2%),与广东( 64.2%)、福建( 64.1%),同居全国前列。该年,化纤布(  $5.03 \times 10^8$  米,占全国的 23.0%,下文仅列百分比)呢绒  $3347 \times 10^4$  米 9.9%),丝(  $2.03 \times 10^4$  吨 27.4%),麻袋(  $0.78 \times 10^8$  条 12.7%),罐头(  $31.43 \times 10^4$  吨 14.0%),日用精铝制品(  $1.40 \times 10^4$  吨 17.1%),产量居全国第一,饮料酒(  $172.93 \times 10^4$  吨 17.1%),产量

- 9.9% ) 缝纫机  $88.24 \times 10^4$  架 10.6% 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位 $^{\circ}$ 。
- 3.人力资源优势与初始资本累积的实现。大批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小企业家和能工巧匠,大量具经商传统、市场意识强、敢冒风险、吃苦耐劳、走南闯北的劳动者,使浙江得以利用"轻、小、加"的工业优势和商业优势,抓住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率先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累积,并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 (五)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

"轻、小、民、加(轻工业、小企业、民营企业、加工业)的经济结构,既有效地化解了浙江能源不足、原材料匮乏的资源瓶颈(轻工业),又使浙江有可能抓住计划经济失误造成的巨大市场空间而率先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累积,既适应了国有企业和重工业薄弱的省情,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优势,小企业利用了劳动者独立经营的能力,加工业则为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提供了大展才华的平台。这一经济战略既是对早期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是对"轻"工业省情的适应、光大和再创新。为缓解"资源瓶颈"发挥轻工业、加工业的优势和扩大市场,浙江还实施了(资源、产品)两头"在外和建设"市场大省"的战略,并形成"轻、小、民、加、贸"内在统一的经济结构。没有这一扬长避短的"轻"型经济结构而求大、求重,也许就不会有浙江的今天。

### (六)区位现象"

- 1." 错位论 "。" 错位论 "视" 浙江现象 "为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错位 ,特别是低人口受教育程度 与高速经济发展不对应的一种'错位现象"。该论断的主要认知背景是,人口受教育程度高是经济 起飞的关键 该论断为二战后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明) 由是 浙江经济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 况下的高速发展便成了一个"谜"——"浙江之谜"。同样、陕西、山西经济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情况下的滞后(表1)也成了"谜"——"陕西之谜","山西之谜"。 按照'错位论'的逻辑 这些'谜"的 " 谜底 "只能是" 浙江精神 "。" 错位论 "对" 浙江现象 "的提出" 浙江现象 "和" 浙江精神 "研究的推动 , 其历史作用无疑是显著的,而隐含的问题是可能影响了对"浙江现象"的科学界定、正确解读和深入 研究,也不利于对"浙江精神"历史作用的准确把握。概略而言,这些问题中,一是对包括受教育程 度在内的发展条件的过低判断 而这也正是"错位论"的基点 否则 便不存在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 的错位,也便没有"浙江现象"和"浙江精神";二是把"浙江现象"看作是一种特殊现象;三是对"浙江 精神 '的( 无意识 )拔高 发展效绩多么之好 ,发展条件又那么之差 ,由此 ,作为错位谜底的" 浙江精 神 "之" 高 ".便同样成了一种逻辑结论。对错位的解释还有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产 权 即浙江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和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 成浙江人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 或人力资 本产权(控制权、经济权)残缺程度通过制度创新的降低——作为人力资本承担者的个体有着较高 的对自身使用的支配权和经济索取权<sup>91 pp. 47-48)</sup>。这些解释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并不能回答 或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体制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产权残缺程度在东中西存在的地域 差异。
- 2." 图景论 "。" 图景论 "视" 浙江现象 "为发展效绩、发展特征、发展条件、体制创新、" 浙江精神 " 等所展现的一种全方位综合现象。由此 避免了" 错位论 '对" 浙江现象 "解释的片面性 ,或对" 浙江精神 " 一浙江成功经验全方位的总结和深入研究 ,也正是在 " 图景论 "的视角下广泛展开的 ,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也都贯穿和体现着这一观点。
  - 3." 区位—图景论 "。笔者倡导的" 区位—图景论 "只是对" 图景论 "的些许补遗。

① 相关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54-456 页的表 10-31。

第一"浙江现象"是一幅为发展效绩、发展特征、发展条件、体制创新、"浙江精神"所全方位展现的宏伟图景,而作为这一展现之根本的发展效绩——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一种'区位现象'和'共有现象",其共有解是"区位"——在由这一普遍现象构成的宏大地域图景中,璀璨的'浙江现象"乃是这幅相互辉映图景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事实上,走在发展前列的浙江,同广东、江苏、山东等仍属同一方阵——浙江人均 GDP 最高,广东、江苏则分别在经济总量、经济密度上居首,若江苏人口密度与浙江相同,则其 2003 年人均 GDP 将为浙江的 1.3 倍而有 26 284 元(表 1)。此外,当我们把'浙江现象'视为一幅图景,特别是区位图景的一部分时,便从机制上消除了对"浙江现象"解释的片面性和对"浙江精神"的拔高。

第二 "浙江现象"的特殊性 表现为展现和成因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寻求发展 ,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江苏的政府发动和乡镇企业,广东的外资利用(表1)和个体经济,在浙江则为民营资本、专业市场和"浙江精神"。

第三,沿海各地的发展条件各有优劣(表1),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在总体上的低位运行,使各地区的差距并不显著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浙江的发展条件并不像'错位论'认为的那么差,而是限制与支持并存,且总体为优,即在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之间,并不存在足以导致'错位论'界定的'浙江现象'产生的错位,否则,便不会有'图景式'、"浙江现象'的生成。事实上,如本文以上所述,浙江存在不少推进发展的优势,如人力资源优势、轻型经济优势、商业优势、生成'浙江精神'的文化传承优势,而一些限制条件,其实并不存在(如受教育程度对发展的制约),或不那么显著(如经济基础),或在发展过程中被有效化解而成为发展的动力(如'资源瓶颈'对'轻'型经济战略的推动,重工业基础薄弱减少了轻工业发展的结构性阻力",边缘地带"与'体制真空'的形成",边缘群体"与强烈创业冲动的形成和对制度创新的有力推动等)——由此,改革开放以来以区位为背景的"浙江现象"的生成,便是一种从逻辑到条件的必然。

第四,中国东部,尤其是包括浙江在内沿海各省的发展。在历史上都具较内地有利的区位优势——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扼制了这一优势而导致普遍的贫困化,改革开放则使这一优势在市场条件下得以发挥,由此带来中国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和"浙江现象"的生成。

#### (七)余论

一切事物皆处于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一切结论都以一定的历史"时—空"为背景而非一成不变。如前所述,在初步工业化阶段影响发展的条件,有的并未发生作用,有的被化解或转化为推动力量,而随着发展向高度工业化的推进,生成"浙江现象"的条件再一次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从对发展的限制看,这些变化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被化解了而在新形势下重新凸现的制约因素,如"资源瓶颈";第二,优势转化为劣势的因素,如资本的小规模;第三,优势面临巨大挑战的因素,如(原料、产品)两头在外"的战略;第四,优势不再或显著减弱的因素,如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第五,作为发展代价而新生成的限制因素,如"生态"环境)瓶颈";第六,当时未构成限制而今后影响将愈加显著的因素,如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浙江未来发展——"浙江现象"持续辉煌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须有由政府发动的政学合作,多学科参与的广泛、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此外,作为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和强化的"浙江精神"既不等同于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也非全然为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在推动"浙江现象"生成的同时,仍存在一些影响发展之处而亟待进一步的提升[3] [pp. 206-219] [7] [pp. 178-183]。

### 「参考文献]

- [1]胡祖光, 曹旭华. 浙江所有制结构变革与经济发展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2] 万斌 汪俊昌 陈兴华 ,等. 浙江改革开放 20 年的理性思考[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3] 祁茗田 陈立旭.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M.1.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4]潘纪一,马淑鸾,王瑞梓,人口素质与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 5 ]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6]洪银兴.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7] 万斌 谷迎春 卢敦基. 学者视野中的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M1.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8] 原华荣.人口与发展[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 [9]朱晓明. 浙陕人力资本与经济的错位玄机[]]. 瞭望 2005 (4):47-48.

[责任编辑 江予新]

# An Analysis of "Zhejiang Phenomenon"

YUAN Hua-rong

( Populationg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Zhejiang Phenomenon" is a panorama, which is exhibited by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conditions, system innovations, and the "Zhejiang Spirit". "Zhejiang Spirit", rooting itself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resources and focusing on "independence, seeking benefit, exploitation and innovation, struggling for progress, and changing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is the key factor since it is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other aspects of "Zhejiang Phenomenon". The establishment of "Zhejiang Phenomenon" is a joint work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Zhejiang 's geographical location—It is on the coastline and has excel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hejiang 's human resources—It consists of a large quantity of outgoing entrepreneurs and skillful artisans with business tradition, marketing consciousness, the desire to seek benefit, and excellent abilities to collocate resources; Zhejiang 's administrative systems—It has the advantage of making innovations earlier than other provinces; Zhejiang's civilian operating capital—It has a huge accumulation created by the mistake of planned economy; Zhejia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light, small, civilian, process, trade" and "two sides" (material, product). All of the above factors are crucial to "Zhejiang Phenomenon". We cannot interpret "Zhejiang Phenomenon" if any one of the factors is left out. Some of the development restricting factors are being eased off, like the "light industry type" and "two sides" strategy which allow Zhejiang to avoid the "bottle neck of resources"; others are transformed to motiv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like "system pressure" and "resource pressure". The "Dislocation Theory" regards "Zhejiang Phenomenon" as the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imbalance of low population education level as against a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use of "Dislocation Phenomenon" may be "Zhejiang Spirit", may be system innovation, may be the ability of resources

relocation of Zhejiang people , or may be the reduction of the imperfection level of property right of human capital. All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impel people to study "Zhejiang Spirit" , to innovate systems and improve the human resources , but unilateralism of those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rise of research object are harmful to the objective realization of "Zhejiang Phenomenon". The mainstream "Prospect Theory" avoids the shortage of "Dislocation Theory" in interpreting "Zhejiang Phenomenon". This theory studies the experience of Zhejiang 's success. The author ("Regional/Prospect Theory") thinks that there are both support and constraint in Zhejiang 's development condition. "Zhejiang Phenomenon" began in the east coast of China when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as first put into practice. In history , eastern China and the coastal areas have a significant regional advantage over the inland. This advantage was not demonstrated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Zhejiang 's civilian capital makes "Zhejiang Phenomenon"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Jiangsu and Guangdong. The former province relies 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hile the latter relies on foreign capital.

Key word: Zhejiang Spirit; Zhejiang Phenomenon; analysis; regional panorama

本刊讯 2005年10月13日至17日,由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及法国保罗塞尚埃克斯马赛第三大学欧亚研究所主办,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承办的'中法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数十位中法行政法学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各位中外专家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和法国的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现状,并共同探讨了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概念界定、公共利益和公共用益的区分,以及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程序设计、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救济途径等重要问题。本次会议研讨氛围热烈,互动交流积极,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刊讯 2005年9月19日,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区餓教授应邀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师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且生动活泼的学术报告——"漫谈研究:处理好人文社科研究的几种关系"。区教授指出"研"者"磨"也"究"者"穷"也,并辅以"两次鸦片战争中白银的流向"等例子,深入浅出地说明,研究要跳出学科的樊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关于如何处理好研究中的几种关系,区教授更是现身说法,告诉听众"发散与收敛的思维方式"两者在研究中的不同作用和贡献"有心与有力"因课题来源不穷,治学需要"不疑处有疑""广博与专精"则劝导大家要努力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区教授的讲座对广大师生颇有启迪作用。

本刊讯 2005年 10月 18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周谷平教授代表学院与英国 Bristol 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莫家豪教授签订了旨在推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英国 Bristol 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合作和交流的友好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将在自愿、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师生交流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和交流。周谷平教授代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对莫家豪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将全力推进和拓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双方均表示将就合作交流的细节作进一步的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实质性的合作与交流。